适用性广、包容度高、操作性强

——论赵毅衡“伴随文本”理论之三个比较优势

李玮

摘　要:“伴随文本”理论,是赵毅衡教授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或称“文本间性”)、热奈特的“跨文本”、麦克林的“附加文本”、瑞恰慈等的“语境论”、洛特曼的“符号域”以及国内学者的“潜文本”、“隐文本”等理论基础上,所推演和发展出来的一种文本互文理论。本文将其与“互文性”、“跨文本”、“符号域”等概念理论做比较,认为伴随文本理论是一种适用性广、包容度高、生命力强的理论,原因在于:它能同时适用于语言学领域和非语言领域的文本分析;它兼顾了伴随文本对文本生成和解释两个环节的影响;它能有效协调宏观指导性与微观操作性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伴随文本;互文性;跨文本;符号域

任何符号文本都无法孤立地进行释义,因为世界整个都被淹没在符号行为之中,世界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结构。换言之,每个文本都淹没在一个巨大的文本世界之中,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称为“文本间性”,被热奈特称为“跨文本关系”,被玛丽·麦克林称为“附加文本”,被国内学者称为“潜文本”、“隐文本”、“互文性”等。这种关系,也被瑞恰慈等人纳入“语境论”、洛特曼置于“符号域”当中予以探讨。赵毅衡教授将与文本存在文本间关系的、那些“被符号文本‘顺便’携带着”的,“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但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①]的因素,统称为“伴随文本”。他认为,伴随文本是所有符号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伴随文本的存在,使符号文本得以成功“携带上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使符号文本成为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②]此外,他还根据文本间建立关系方式的不同,将其细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文本/后文本六类。

本文试图说明,相比于文本间性/互文性、跨文本关系、符号域等相近概念来说,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首先使对互文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语言和文学领域,而能有效地扩展至包括电影、广告、新闻等在内的非语言符号领域;其次,使原来被忽略的解释性互文影响得到了重视;第三,使互文性不再停留于一些相对宏大的思想理念,能顺利着陆到各种具体问题分析当中,并使符号文本的互文问题微观化、可操作化,有助于对符号文本“文本间性”进行认识和分析。

一　较之“互文性”/“文本间性”之局限于语言学和文学领域,“伴随文本”的适用对象还可扩展至非语言符号领域

虽然克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都认为,互文思想最早来自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却是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一书中完成的。克里斯蒂娃用“互文性”概念来表达“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映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③]的特征,她将文本与一个文化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认定为“互文性”;将与一个文本有关的其他文本称为“互文本”(intertext);将“互文”认定为文本之中隐藏着的一个文化中的文本传统积累,是“文中之文”、“书中之书”[④]。

后来的学者对“互文性”有各自的理解:罗兰·巴尔特在其《大百科全书》之“文本理论”词条开篇即道,“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合和引用已有的言辞”[⑤]。马拉美也表示过,“所有的书多多少少都融入了有意转述的人言”[⑥]。菲利普·索莱尔斯描述道,“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⑦]。麦克·里法特尔将“互文性”引至接受层面,用其指“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换言之，这种无时序的读者记忆，只要对阅读发生作用、能促成读者对作品的延续，就构成互文性。[8]吉拉尔·热奈特将“互文性”理解为“文”与“他文”之间所维系的关系的总称，尤其强调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派生关系的“超文性”，将其从一个语言学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学创作概念。[9]安东尼·孔帕尼翁着重系统研究了作为互文手法之一的“引用”，他将引用描述为“一段话语在另一段话语中的重复”，“被重复的和重复着的表述”；“再造一段表述（被引用的文本），该表述从原文（甲文）中被抽出来，然后引入受文（乙文）中”；并认为，引用是所有文学写作中需要进行转换和组合的标志，“拼贴加注解，引用加评论”是所有文学写作的模式。[10]阿拉贡喜欢用“粘贴”来比喻互文，并认为，“粘贴”是指“把别人的、已经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写的作品里”，其旨在“推出我的出发点”。[11]洛朗·坚尼则建议，互文性不能被界定得那么宽泛：“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一篇文本的言辞之外认出业已成型的表达成分时，无论这种定型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才能认同互文性的存在。”[12]米歇尔·施奈德则用“文为他用”指抄袭，“文下之文”指隐文，“文如它文”指仿作，且认为互文性远不只是写作的一种现象，而是写作的基本机制和存在原因。[13]约翰·费斯克则关注了互文本的运作分布情况，他提出，分布在水平面的是类型、角色和内容等因素，分布在垂直面的是指原文本和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14]如此等等。

学者们对互文性的理解，大都将“他性”——即文本中承载着其他词和其他人的词的现象视为“互文性”概念的本质，但仍存在以下一些分野。第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解的互文性，是将互文性认定为“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之间所具有的相互指涉关系”，如巴赫金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书中之书”、巴尔特及其引文拼接艺术、里法特尔及其阅读延续等。狭义理解的互文性，则以热奈特的“跨文本性”及其对互文形式类别的论述、安东尼·孔帕尼翁及其引文研究、阿拉贡及其“粘贴”论述、洛朗·坚尼及其变换方式研究、米歇尔·施奈德及其心理分析等为代表，指“任何文本明显地或者不明显地指涉其他文本”。第二，文本生成与文本解释的侧重之别。其中，解释性的互文强调读者、受众在互文认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里法特尔认为“互文性”产生于受众的文本接受与解释过程中，需要读者凭借其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和文化积累对文本作出某种延续性、附加性理解；再如洛朗·坚尼提出，只有当人们认出这种言辞之外的业已成型的表达成分时，才能认同互文性的存在。而生成性的互文则将互文性理解为一种旨在通过语境的转化和对比，以凸显语义张力、增强语言传播效果的文本生成手段，如热奈特强调文本创作过程中的超文派生现象，孔帕尼翁和阿拉贡强调引用和粘贴互文手法在文本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施奈德将互文性视为文本生成的机制本身。

然而，现有的“互文性”文本分析的文献显示，互文性常常被局限于语言学、文学领域的文本分析，尤其常被用来探讨某一本/部具体作品中的互文性，或者某两部/几部作品之间内容的互文性，而鲜有将其扩展至其他非语言符号领域。笔者以“互文性”为篇名关键词在 CNKI 中进行搜索，发现用于分析“互文性”的文本几乎都局限在语言文字文本中，且尤为侧重其内容层面的互文，如《社会戏与阿 Q 话语的构建——〈阿 Q 正传〉的阅读方法及互文性研究》、《〈漫漫回家路〉的互文性解读》、《文本间的指涉与互文性的文本——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互文性策略》等等。

“伴随文本”不仅可以适用于语言文字文本的分析，其分析对象还可以扩展至非语言符号文本领域。大，可将之用于图像、广告、品牌、旅游、音乐、时装、演出、艺术品、书籍装帧、期刊杂志、电视节目等各种社会化文本类型的分析，如：饶广祥《论广告的伴随文本》、陆正兰《流行歌曲伴随文本的符号学意义》、蒋诗萍《伴随文本与品牌叙述》、闫文君《作为文学伴随文本的书籍装帧》、李玮《论新闻副文本对新闻收受与解释的影响》、向鹏《作为元文本的翻译》，以及蒋晓丽在论及新闻求真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转向时，也意在说明，“符号之真”的获得，需要依赖伴随文本的核查和检验；[15]小，则可将之用于某一则广告、某一个品牌、某一座雕塑、某一个新闻节目等等具体文本的分析，如冯宪光《文学与传播媒介——〈没有硝烟的战线〉的伴随文本解读》、赵常玲《互文性视角下的罗译〈三国演义〉副文本研究》、修文乔《从傅译副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观与读者观》等。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用于相对静态的作品的内容分析，也可以用于相对动态的文本的形式分析，即所有能适用于“文本”这一概念的对象，都能对之进行“伴随文本”分析。

二　较之“跨文本”之侧重于对文本生成的影响，“伴随文本”兼具生成与解释两个环节

“跨文本”是吉拉尔·热奈特在其《隐迹稿本》中提出的术语，是热奈特对广义“互文性”进行狭义化理解的结果。

在热奈特看来，跨文本性是文学创作的对象，它们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互文性，为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其手法主要为引用、抄袭、暗示、参考等；第二类是文本自身和只能被称为是类文本之间维持的关系，诸如标题、副标题、序等等；第三类是元文性，指一篇文本和它所评论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第四类是“超文性”，即《隐迹稿本》中所讨论的对象，指一篇文本从另一篇已然存在的文本中被派生出来的关系，如戏拟、仿作等；第五类，统文性，指文本同属一类的状况。[16]

不难看出，在热奈特的跨文本性中，首先，他区分了过去互文性研究中被混淆的两种互文关系——文本内的共生现象（横向）与文本外的派生现象（纵向），并将两者划归为“互文性”和“超文性”。其中，他用前者指两篇文本的共存，即甲文本和乙文本同时出现在乙文本中；用后者指通过简单转换或间接转换，将乙文本从甲文本中派生出来，但甲文本并不切实出现于乙文本中。其次，他认识到了包括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评论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元文性、同属一个类型的两个文本之间的统文性以及文本与文本自身的标题、序言等之间的副文本关系在内的三种互文关系。再次,热奈特对“互文性”和“超文性”的论述,凸显了互文性对文本生成过程,尤其是文学创作过程的作用。最后,相比于之前语言学领域对“引用”、“暗示”、“戏拟”、“仿作”等手法的简单列举而言,热奈特对“互文性”形式的分类,不仅上升到了一个概括性更强的类型划分高度,一定程度上还跳出了语言学的限制,拓宽了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

但热奈特是将“跨文本性”置于文学创作对象这一前提中来对其进行考察的,一方面他未跳出语言学、文学领域这个适用领地,另一方面,在文本生成与文本解释两个环节中,他仍侧重跨文本对文本创作、生成过程的影响,而疏漏了它们对文本收受、解释过程的影响。前一个方面的问题,“较之互文性”部分已有论述。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相比之下,伴随文本理论专门区分了“生成性伴随文本”——文本生成时各种条件留下的痕迹,包含前文本、先/后文本与“解释性伴随文本”——在文本被解释时起作用的伴随文本,包含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虽然笔者曾撰文说明,在“生成性”与“解释性”这一对立性分类上,赵毅衡教授的划分其实不够准确,因为就具体的文本生成和解释实践来说,所有伴随文本都对“文本的接收和解释”产生作用,都呈现出“解释性”特征,而在“影响文本的创作与生成”这一环节上,除“后文本”和“链文本”以外的其他伴随文本都具有“生成性”特征,[17]但赵毅衡对这两种类型的划分,是他对文本间性之既作用于文本创作与生成、又作用于文本收受与解释的有意识体现。从赵毅衡将伴随文本界定为那些“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但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的因素,可见他在重视伴随文本对文本意义生成环节影响的同时,也强调了伴随文本对意义收受和解释环节的影响。

其实,无论是称为“互文性/文本间性”,“跨文本性”,“伴随文本”还是其他,都没有理由疏漏甚至忽略伴随文本对符号文本收受和解释环节的影响。因为,第一,从参与某一个符号文本生成和解释的人的数量来说,参与解释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参与文本生成的人数;第二,从符号文本的意义传播来说,其目的和归宿在于收受者的解释。因此,从兼顾到伴随文本对文本生成过程和收受过程的影响这一点来说,“伴随文本”理论的推进和发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三　较之“符号域”之过于宏大,“伴随文本”兼具宏观指导性与微观操作性

“符号域”是由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于1984年提出,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背景”。[18]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即是指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和发展的空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19]。

洛特曼“符号域”术语的提出,一是有赖于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域”概念,二是来自莱布尼茨的拓扑学。首先,“生物域”概念认为,生命的各个层面相互紧密联系,其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而存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是生物域在一定时空坐标下发挥一定作用的产物,因此,生物域是生物的有机综合统一体,是生物得以延续的条件。基于此,洛特曼引申出“符号域”概念,着重于强调符号域这一民族文化载体中各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紧密关系,认为符号域不仅是包含众多独立子系统在内的统一母系统,更是诸多子系统存在及发挥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其次,拓扑学对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的研究,影响了“符号域”中的空间思想。洛特曼引用拓扑学中的“变换中的不变”,来追求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开放互动、动态平衡这一发展本质。此外,他还将拓扑学中的区域、边界、位移等概念演绎到文化符号中,并认为:第一,文化是由文本符号构成,且这些文化文本符号是有序地多层级互动地共存于符号域之内。第二,“符号域”可分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其中,中心区域是互相连通的、最发达、最严谨、最核心的符号区域,位于中心区域的是主流文化和原型文化;边缘区域则是远离中心的区域,具有不可连通性,需要依靠中心与边缘的互动,边缘区域的文本才得以日益凸显;位于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是边界,边界是相对固定但又不断变迁的。第三,众多的文化文本和文化语言共同构成了文化符号系统,构成民族文化的整体,符号域就是这个文化符号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空间场域。在其中,文化文本不断运动,产生位移,产生有序结构对无序结构的侵入和无序结构对有序结构的侵蚀。

总之,正如洛特曼本人在《类型学描写文化的元语言》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我们尝试在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描写的元语言,尤其是利用拓扑结构(这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图形和同胚变形后不变的特性)。我们的想法是:对图形和轨迹拓扑性质的描述结构,可以用做文化类型研究的元语言”,在此过程中,期望能通过“找出各个子系统的恒量文本,最终得出属于该文化类型的所有文本的恒量”,进而推断出整个文化的恒量,“符号域”被称为“一种描述文化的工具语言,或曰‘元语言’”。

不难看出,“符号域”是一个较为宏大的概念范畴,它虽能为互文研究提供一定的战略指导和观念指导,但却缺乏较为微观可行的方法指导。也即是说,“符号域”不能作为一套可行的分析工具来方便使用。相反,在这一点上,伴随文本理论较好地衔接理念与方法、宏观指导与微观操作。

就微观层面的操作方法来说:赵毅衡教授在系统界定“伴随文本”的前提下,将伴随文本分为副文本(框架因素)、型文本(类型因素)、前文本(引用因素)、元文本(评论因素)、链文本(链接因素)、先/后文本(续写因素),这其中,每一类型的伴随文本几乎都有其相对明确的关系指向和相对稳定的作用,无疑,这就能为具体的文本生产和文本收受提供极具操作性的策略指导。换言之,在面对随便一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符号文本时，通过这几个类型，我们都能轻松找出其伴随文本，且分析出这些伴随文本在我们的意义收受和解释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如以一则报纸新闻文本为例，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影响其生产和解释的伴随文本：有新闻文本生产或刊载的媒介机构及其性质、地位、所在区域，新闻文本所刊播的媒介类型、内容板块、栏目以及新闻文本的署名人等副文本；有体裁、领域等型文本；有媒介批评、新闻评奖等元文本；有新闻链接等链文本，等等。并且，我们还能确定在一次具体的收受实践中，是哪些因素与文本本身一起，共同影响了受众的解释。

就宏观层面的理念指导来说：伴随文本理论有助于揭示出文化符号域是如何施加影响于单个的符号文本，以及单个的符号文本及其伴随文本是如何共同构成文化符号域的。虽不甚精准，但符号文本与文化符号域之间的影响机制可大致描述为：一个符号文本在其表意过程中，有很多伴随文本会影响其文本意义的收受和解释，我们可以将这些伴随文本假设为：伴随文本1、伴随文本2、伴随文本3……伴随文本n；而对每一个伴随文本的意义的确定，又需要依靠更外一层的伴随文本来实现，也即伴随（伴随文本1）、伴随（伴随文本2）、伴随（伴随文本3）……伴随（伴随文本n）。如此层层向外演绎和推进，一个文本的生成和理解，需要其伴随文本来辅助；其伴随文本的生成和理解，又需要伴随文本的伴随文本来辅助，无疑，最终将无限逼近社会文化符号域。

基于此，笔者认为，赵毅衡教授的“伴随文本”理论，是博取众家之长的、相对比较综合、准确和完备的理论：它既能涵盖语言学领域又能拓展至非语言符号领域、既包含“生成性”互文又包含“解释性”互文、既能表达宏观理念又具微观操作能力、既着重文本内部的水平面运作互文又囊括文本之外的垂直面运作互文、既强调互文的关系建立形式又暗含互文对意义生成和解释的影响，它适用性广，包容度高，操作性强，因而也应是众多同类理论中生命力较强的一种。

注释：

①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②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③曾爱华《传媒语言的互文性研究》，湖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版，第9－10页。

④参见克里斯蒂娃《小说文本》，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4页。

⑤［法］罗兰·巴尔特《大百科全书》之“文本（的理论）”词条，1973年出版，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⑥［法］马拉美语，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⑦［法］菲利普·索莱尔斯选编《理论全览》，Seuil出版社1971年版，第75页。

⑧［法］麦克·里法特尔《未知的互文》，选自《文学》杂志第41期。

⑨［法］吉拉尔·热奈特《隐迹稿本，二级文学》，Seuil出版社1982年版，第9－15页。

⑩［法］安东尼·孔帕尼翁《二手文本或引用工作》，Seuil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⑪［法］阿拉贡《粘贴》，Hermann出版社1965年版，第123页。

⑫［法］洛朗·坚尼《形式的战略》，载《美文》杂志第27期。

⑬［法］米歇尔·施奈德《窃词者》，Gallimard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页。

⑭John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Popular Pleasure and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7.

⑮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⑯［法］热奈特《隐迹稿本，二级文学》，Seuil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⑰李玮、蒋晓丽《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⑱王铭玉《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研究》，《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3期。

⑲郑文东《符号域：民族文化的载体——洛特曼符号域概念的解读》，《中国俄语教学》2005年第4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舆论编码的符号机制与策略研究”（14CXW027）阶段性成果；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阶段性成果；2013年度西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人文社科类）“新闻编码的符号策略研究”（13NW2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玉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